

古籍无语 墨香悠长

——记明清时期聊城的坊刻印书业

文/图 本报记者 于新贵

在聊城市图书馆四楼的“聊城印书业展”展厅里，陈列着数百册坊刻古籍。这些古籍经过岁月的洗礼再次汇集，用淡淡的墨香诉说着聊城坊刻印书业经历过的辉煌时代。

“书铺开了几十处，刻版印书销四方。四大家名声通四海，贸易远达黑龙江。首屈一指书业德，宝兴、有益、善成堂……书店事业冠全省，各地书贩奔东昌。”这是聊城民俗专家吴云涛在《逛东昌》一书中描述的清朝时期聊城印书业的繁荣景象。

以书业德、善成堂、宝兴堂、有益堂“四大书庄”为代表的聊城印书业滥觞于明初，在康乾盛世到民国初期这一阶段进入鼎盛时期。彼时，聊城古城内以及东关街、清孝街上书庄林立，铸就了聊城在全国坊刻印书业中的地位。

书庄林立 前店后坊近百家

聊城印书业鼎盛时期，到底有多少家书庄？聊城市图书馆馆长林虎介绍说，聊城近些年广泛搜集的资料可以印证，目前可知且有实物图片证明的书庄字号有60余家，但这并不是全部，初步估计清代聊城坊刻印书书庄应该有百余家。除了“四大书庄”之外，还有敬文堂、文英堂、聚锦堂、聚和堂，以及崇文堂、文奎堂、万育堂、二酉堂、锦文堂、三友堂等一些中小书坊。

伴随着漕运业的繁荣，当时的聊城经济进入鼎盛时期，文运大开，鸿儒卿相争相而至，书院满城书满城。坊刻印书业蓬勃兴起，一时间，书、笔两行成为聊城的龙头行业。当时，聊城刻书印书的历史地位，甚至与北京的琉璃厂、上海的棋盘街齐名。

这些书庄，多数聚集在古城楼东大街两侧，尤其是东口到东门之间。

刻书繁多 种类达数千种

开业于康熙年间的书业德，是聊城最大的书庄，除聊城总号外，还在山西的太原、祁县、忻县、介休及山东济南等地设有十几个分号，大量推销书籍。书业德的书籍销往山西、河北、山东、河南、东北三省以及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南京、徐州等地。据考证，书业德刻书有1000多种，木板分经史板库、启蒙书板库、小说板库、医杂板库等，分库保管。

开业于乾隆初年的善成堂，除了在北京开设有天成堂书庄外，还在济南、济宁、菏泽、张家口、包头等地设有善成堂分号。善成堂以印制“闹墨”（状元、进士的文选）

出名，有100多种。善成堂经销“闹墨”的数量之多是其他书庄无可比拟的。

此外，东郡二酉堂刻印有《应制体诗——幽风月令》《唐诗灵通解初集》，东郡锦文堂刻印有《新镌对联锦囊》，文英堂刻印有《今诗合刻试律浅说易知集》，崇文堂刻印有《崇文字汇》，三友堂刻印有《增补四书左国辑要》，聚文堂刻印有《详校古文释义》，书业堂刻印有《周礼节训》，敬文堂刻印有《诗韵题解辨同合刻》，锦文堂刻印有《对联精选》，文蔚堂刻印有《紫阳易经》，文筠堂刻印有《时艺阶》，叶氏书林刻印有《墨谱》《制艺简摩集》，宝书堂刻印有《铜板五方元音大全》，经余堂刻印有《诗经体注图考大全》《四书补注附考备旨》等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有益堂在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刻印了一部《净发须知》，该书是全国唯一现存的理发技术单刻本。此书由清朝吴铎编订，共两卷，分别题“京本江湖博览净发须知上卷”和“京本江湖博览按摩修养净发须知下卷”。该书图文并茂，以问答、歌诀等形式系统地介绍了古代剃头、按摩的各种方法及注意事项，详述了推拿、点穴等施术之诀窍，是一部专门记录理发技术的著作。有益堂为我国传统理发业作出了贡献。

盛极一时 书香绵延数百年

聊城坊刻印书业滥觞于明朝初期，康熙年间已有多家书庄作坊，到了乾隆年间，坊刻印书业逐渐繁荣起来。

明初，迁徙到东昌府堂邑一带的移民中，有不少精通印刷和雕版的技工、艺匠。落籍之后，他们为了谋生，又重操旧业，刻印启蒙读物和通俗读物。因此，明朝初年，聊城出现了一些小型作坊，好友堂是最早的一家。虽只印卖启蒙读物、通俗读物、唱本之类的书，却开创了聊城坊刻印书业的先河。

从康乾盛世到民国初期，是聊城坊刻印书的繁荣时期，足有二百多年之久。骡马大车、手推小车往码头或货栈运送打包的书籍，经运河运往全国各地销售，呈现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忙景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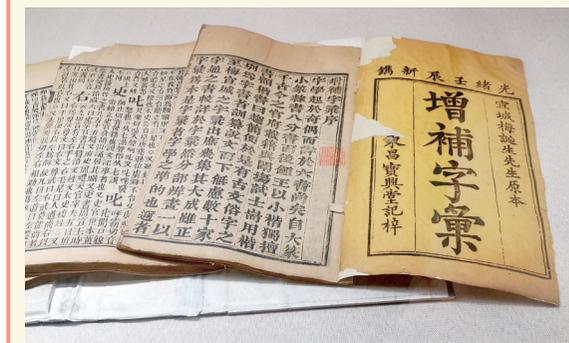
“四大书庄”的刻书平均在500种左右，有的甚至上千种，其他如三合堂刻印过200多种唱本，这么大的出版量是北方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企及的。有研究专家断言，北京是北方最大的图书贸易中心，而东昌府是北方最大的坊刻印书中心。

东昌府刻书印书的历史地位早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。《中国通史》（白寿彝主编）中说：“晚清时期，书肆、书坊比较集中的有北京的琉璃厂、上海的棋盘街、山东的聊城、四川成都的学道街等地。”

繁荣的坊刻印书业，给聊城带来了氤氲书香，这座城市也由此而富有魅力。



书业德刻书



宝兴堂刻书

古籍研究专家认为

聊城是清代北方坊刻印书中心

本报讯（记者 于新贵）“清朝时期，聊城坊刻印书业十分发达，并借运河之利将书籍销往全国各地，成为当时的北方坊刻印书中心。”8月28日，山东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何朝晖教授在聊城大学举办的“清代东昌府坊刻的特点与意义”讲座上说。

现有资料证实，光绪年间，聊城坊刻印书业发展到巅峰，以书业德、善成堂、宝兴堂、有益堂“四大书庄”为代表的近百家书庄遍及古城东大街、东关街和清孝街，刻印了千余种包括“四书”“五经”在内的各种书籍。

何朝晖教授常年研究东昌府坊刻印书，并取得重要成就。他认为，明清时期，得益于京杭大运河，聊城经济繁荣，文运大开，私塾众多，尤其是堂邑刻版工匠为坊刻印书提供了支撑。聊城的坊刻印书业盛极一时，并与南方坊刻平分秋色。这是中国北方较为罕见的文化现象，聊城也因此成为清代北方坊刻印书中心。

公益广告

争当文明使者
创建文明城市

